

半年报显示业绩增长强劲，个体分化仍较明显——

城商行转型发展有喜有忧

本报记者 王宝会

财金观察

近日，在A股上市的16家城市商业银行2021年半年报披露完毕。在银行业改革发展大背景下，16家城商行稳步推进包括跨区域发展、完善科技金融支持、多元化经营等举措，资产质量迅速提升。同时，一些城商行在净利润和吸收储蓄等方面分化明显，化解不良资产风险和转型发展任务艰巨，这是城商行面临的最大挑战。

利润全部实现增长

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等16家在A股上市的城商行分布于10余个省份。半年报显示，这些城商行净利润和资产规模同比全部实现正增长，但不同区域的银行之间业绩分化明显。

从净利润的角度来看，城商行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虽然都有增长，但是分化明显。净利润排名靠前且达百亿元以上的是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分别达125.83亿元、122.78亿元、101.99亿元，同比增长分别是9.28%、10.3%、25.2%。净利润排名靠后的城商行是齐鲁银行、西安银行、厦门银行，分别为14.9亿元、14.18亿元、10.71亿元，同比增长分别是12.29%、5.21%、12.61%。

从资产规模上看，北京银行资产规模总量在16家城商行中是最高的，达3.06万亿元；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杭州银行资产规模分别位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分别是2.62万亿元、2.55万亿元、1.83万亿元、1.66万亿元、1.28万亿元。而齐鲁银行、西安银行、厦门银行的资产规模相对偏小，分别为4029.54亿元、3213.13亿元、3074.19亿元。

从吸收储蓄规模上比较，16家城商行在吸储规模上同比都出现增长，有6家银行增幅超过二位数，10家为个位数增长。其中，最高的成都银行增幅为18.4%，最低的贵阳银行增幅为0.52%。值得注意的是，个体银行吸储额差别较大。比如，以万亿元作为一个区分度，第一梯队城商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吸收存款额分别是17131.59亿元、14196.09亿元、14735亿元、10437.95亿元、10478.79亿元。除杭州银行存款总额达7441.95亿元之外，剩下的城商行吸储额处于2000亿元至5000亿元之间，在这个区间内的成都银行存款总额最高达5268.63亿元，但是仅为第一梯队城商行吸储额的一半。

对于城商行个体业绩分化的现象，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金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下，银行业出现分化是一个行业的主题，城商行除了面对整个行业的竞争压力、行业息差收窄的挑战之外，还要面对能不能跟上数字化建设步伐等方面的挑战。此外，城商行大多是区域性银行，有的业绩做得比较好的城商行，网点已在省内和省外布局，有的则局限在本地区经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造成城商行业绩分化的因素之一。例如，上海银行在北京等大城市都有分行，经营地域更广，业务发展优势更明显。此外，城商行内部管理、客户结构、信贷结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差异也会造成分化。

风控能力待提升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从440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评级结果较好，部分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存在一定风险。中小银行中，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的评级结果较好；城市商业银行的评级结果次之，有10%的机构为高风险机构；农村机构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

相比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大行，城商行起步较晚，实力较弱。在城商行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合理控制流动性风险尤为重要。上海银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7.2亿元，较去年末增长25.9%；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则由去年末的2.39%提升至今年6月末的2.73%。而这相较于2019年末的0.1%，增长了26.3倍。宁波银行的情况类似，截至6月末，房地产业不良贷款金额为5.37亿元，较去年末增长近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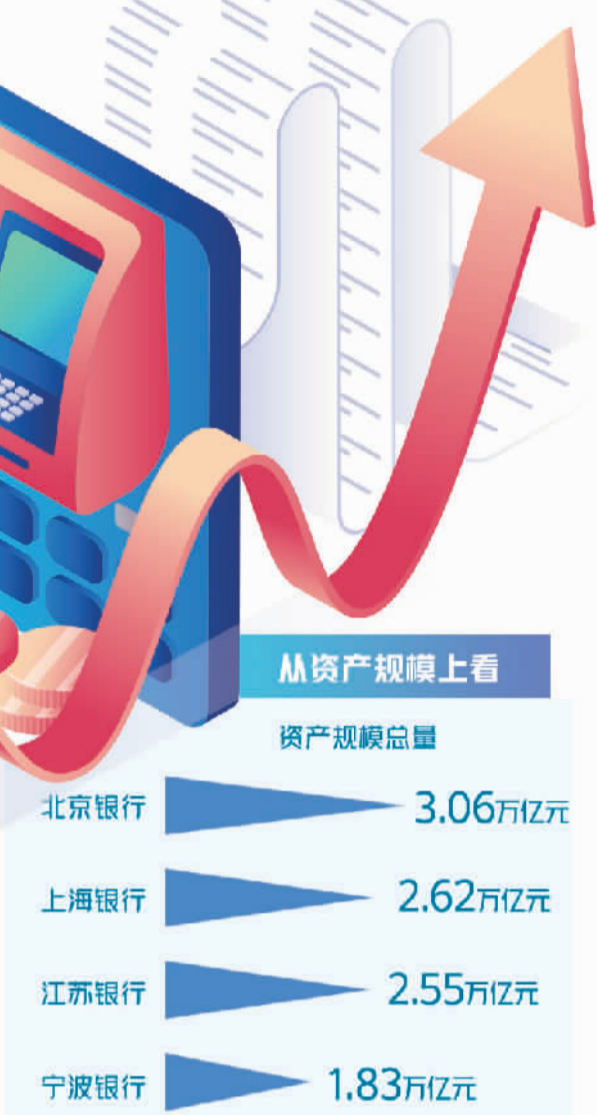
同时，有的甚至在涉房贷款方面逼近监管红线。成都银行半年报显示个人购房贷款为762.71亿元，占贷款总额达22.2%。长沙银行住房按揭贷款从去年末的517.58亿元增长至576.23亿元，增速高达11.33%，占贷款总额达16.62%。根

统计显示，2021年二季度末



半年报显示

● 16家上市城商行净利润和资产规模同比全部实现正增长 净利润排名靠前的是



据央行、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城商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上限为17.5%，问题应引起一些城商行的高度重视。

此外，在个人贷款方面，截至6月末，宁波银行个人贷款不良金额为32.78亿元，较去年增长41.53%。在个人消费贷款方面，上海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不良余额和不良率有所上升，上海银行作出解释，这主要因该行零售资产投放结构调整，消费贷整体规模较上年末下降，推升不良贷款率上升。

曾刚表示，城商行应对不良贷款风险，从存量角度上，应加快存量风险处置核销力度，及时有效地降低存量风险影响，否则会影响城商行长期资源配置效率；从增量角度上，整个银行业都应该把握国家层面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布局，准确评估贷款投向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

在金融产品不断创新和金融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商行若想稳健经营、长远发展，就必须优化信贷布局、提升风控能力，进而推动业务转型升级。

加快转型成关键

近年来，城商行在我国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寻求新的机会推动综合化转型，且已成为破局关键。

“但是并不是所有城商行都能做到顺利转型，这个可能需要头部银行做出更多探索。因为不依靠传统业务后银行息差收窄，那么就需要去拓展非利息收入来源。这些非利息收入都不是表内业务，属于轻资本业务范围，其优势就是对于资本消耗比较小，在资本回报率方面对城商行更有吸引力。目前来看，头部城商行大多设立理财子公司，包括宁波银行很早就有永赢基金、宁银理财，可以拓展非利息收入，使得盈利来源更加多元。”曾刚表示，下一步，对于体量小一些的城商行，就需要细分专业转型，根据银行的特点和客户需求，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能力，构筑好自身的护城河。

值得注意的是，16家城商行半年报显示，绿色金融、数字化等成为转型的重要发力点。

今年以来，城商行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借助信贷政策优先支持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行业。南京银行推出“鑫制造”“鑫减碳”贷款，引导企业减少碳排放，可以享受更低的贷款利率；上海银行积极布局绿色信贷领域，加大与新能源造车厂商金融合作。从城商行半年报可以看出，这些发力点已经成为其营收和利润的重要增长方向。

此外，与“转型”最为密切的关键词是数字化，数字化转型贯穿银行产品和业务始终。头部城商行数字化建设有资金和人才保障，发展较快。但是对于中小城商行，数字化自建成本过高，投入产出的价值相对较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中小城商行可以通过外包方式，尝试各类数字化技术新应用。金融科技的第三方支持比自建成本更低，且通过接口链接的应用功能会更加丰富，可以助力中小城商行通过差异化服务增强竞争力。

从总体上看，城商行未来的转型，就是推动公司业务朝着综合化、高质量的目标前进，从根本上还是要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导向展开。曾刚表示，一些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和战略，比如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城商行要及时顺应发展大势，根据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机遇和需求，及时布局，找准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抓手。

陶然论金

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私募基金行业要更加突出回归行业本源，坚守“真私募”定位。

何为“真私募”？私募基金一般指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少数特定资格的投资者募集资金，通常豁免审核(但须备案登记等)而设立的投资基金。目前，金融管理部门对私募基金的定位是准金融机构，尚达不到商业银行、商业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正规持牌机构的地位，一些针对持牌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也不适用于私募基金。再加上私募基金在法律层面缺乏明确内涵和本质的法理界定，全行业关于私募基金本质和治理规范的共识尚处于形成之中，这些情况给鉴别真伪私募带来一定挑战。

抛开争议之处，现行公认的合法“真私募”至少具备四方面特点：一是我国对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和发行私募基金虽不设定行政审批，但私募基金管理人需要向基金业协会登记，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要到协会备案；二是私募基金只能采用非公开的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且合格投资者人数不能超过200人；三是私募基金的合法法律载体为公司、合伙企业或契约制组织；四是从工商登记等情况看，正规的私募基金公司名字里可能含有“财富管理”“资本”“投资”等字样，而非法私募则不能使用相关字样注册登记，多数也无法到协会备案登记。

但即便如此，从定义和实际看，一些私募机构在发展中偏离应有的定位，以私募之名变相发行公募产品，随意设立资金池，违规变相吸储、放贷，甚至擅自自融自用、侵占挪用基金资产。私募行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真私募与伪私募并存，优秀管理人与“伪”管理人并存，接受登记管理和市场无序生长并存等乱象，严重损害行业形象声誉，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

坚守“真私募”定位，须加快构建规范私募基金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层面，要针对私募基金“准金融机构”的定位谋划长远。目前，虽然已有《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文件，初步形成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等主体的“十不得”禁止性要求，但仍有必要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涉及私募基金的各项基础性制度，尤其要抓紧明确私募基金的权威定义和相关解释。

坚守“真私募”定位，还须敦促广大私募基金管理人回归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居民财富管理和创业创新的根本方向，营造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投资理念，厚植行业文化，突出信义精神，坚持私募姓私，严格规范“募、投、管、退”全链条各环节运作。证券监管部门可考虑坚持分类施策、扶优限劣，以更大格局和更长期规划支持“真私募”，严厉打击“乱私募”，坚决出清“伪私募”，推动形成良好市场秩序和行业生态。

本版编辑 曾金华 武亚东 美编 王墨晗

私募

周琳

保险业服务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于泳

日前，由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中华联合保险集团举办的“保险服务乡村振兴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部署要求，特别是保险行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还有哪些作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今年以来，河南、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农户种植的小麦、水稻，养殖的鱼、小龙虾等受灾严重。中华保险、中国人保等多家保险公司迅速跟进赔付，仅中华保险一家就拿出5.5亿元分担保和化解风险。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尧认为，当前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对保险的总体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农业资产快速积累、农业产业链迅速延长、农民收入期望提升，农业保险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部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时，专门提到农业保险。多位与会专家表示，保险行业要以“农业保险+”为路径不断探索实践，积极强化与其他金融工具的结合，推动保险服务再上新台阶。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建议，要按照乡村振兴需求推进农业保险改革创新，进一步创新健全农业保险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险种体系、基层服务体系和保费补贴分担办法。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农业保险作为现代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有效分散和化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农村生产经营正常有序进行、维持农民收入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然面临着保障水平低，保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提供补贴还显得力量不足。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认为，下一步助力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农业保险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需要实现更大的发展和更大的改革。要注重把科技和保险联合起来，用科技手段加快农业保险的发展，无论是拓范围、增险种，还是提高理赔和服务效率，都需要更深入地利用科技手段。高校和科研机构要用研究来支撑服务好农业保险发展，同时做好农业保险人才的培养、储备和服务。

中华保险集团董事长徐斌表示，在“十四五”时期，中华保险“三农”保险业务占比将由20%提升到25%，将全面提升公司服务乡村振兴的贡献度。为此，中华保险将实施“五个一”工程：每年推出100个特色农业农村保险项目、每年投入1亿元乡村振兴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不少于10亿元乡村振兴产业投资、每年支持100亿元的农村普惠金融综合服务以及每年新增1万亿元综合保险保障。同时在组织、协同、科技、资源、考核方面保障到位，全面推动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的落实。

外储规模总体保持稳定

本报记者 姚进



每周观市

9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21亿美元，较7月末下降38亿美元，降幅为0.12%。至此，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位于3.2万亿美元之上，规模整体稳定。

汇率折算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依然是影响月度外储规模变动的主要原因。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8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平稳，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受新冠肺炎疫情进展、主要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预期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幅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全球股市总体上涨。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真实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规模做出贡献。”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带动下，今年我国出口保持了较快增长，8月，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PMI指数维持了较高的景气度，对我国出口形成支撑。8月，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5.6%，超出市场预期。同时，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债券托管数据显示，8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金额为3.4万亿元，较7月增加304.95亿元。这些因素都对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了支撑。今后外汇储备规模趋势如何？温彬认为，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将继续延续稳中向好的复苏态势，宏观政策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主要经济指标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对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撑。同时，随着一系列金融和外贸开放新举措的提出和实施，在外需较强的拉动下，我国出口有望保持较好增长，人民币资产具有配置潜力，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外汇市场供求有望保持平衡，促进外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

“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具有较多不确定性。疫情持续演变对经济正常复苏形成干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加，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的预期逐渐明确，但就业数据仍然波动较大，反映出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较多不平衡、不均衡因素，可能成为潜在的风险来源。下一阶段，要做好宏观政策的跨周期调节，加大力度提振内需，做好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密切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势，防范其政策收紧可能引发的冲击。”温彬说。

王春英认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但我国持续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经济保持稳定恢复态势，发展质量继续提升，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